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 李衍柱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李衍柱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11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ISBN 7-81079-144-3

I. 经… II. 李… III. 文艺学—文集 IV. 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9174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6521 85228986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2 次
印 数: 1001—4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 者 近 照

总 序

20 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20 世纪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

2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近百年来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都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看为现代文论的范式及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圇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了，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了，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竖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

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第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第二，就是避免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第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第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20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的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

4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绩，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学科，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忻时期的文学理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

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6种。后面几辑将在不同出版社陆续出版。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年9月9日

自序

20 世纪最后的 20 年，是我真正开始学术生涯的 20 年。

20 多年前，当我正式步入学术门槛的时候，自己已进入了“不惑”之年。那时，我同学界的朋友一样，一方面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失去的光阴而痛惜，另一方面又为祖国的春天的到来、学术的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雀跃。“时间就是生命”，当时每个人的那种急切、奋发、向上的心态几乎都是溢于言表。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面对朝气蓬勃、求知欲极强的青年学子，在书的海洋中，我应首先读些什么书和怎样去读书，以及怎样引导学生去读书，是我重新恢复教师工作，走上学术之路遇到的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在孩提时代，任私塾先生的父亲让我熟读背诵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唐宋八大家散文和唐诗 300 首。这些书的内容当时并未理解，但一些名句、佳篇，至今记忆犹新。1952 年青岛师范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领导肖道军同志让我用半年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读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这样做了，收益匪浅。1961—1964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结合学哲学我曾拿了三个月的时间，细读了《实践论》、《矛盾论》，结合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作了大量笔记，从此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原则，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至今我仍然认为在世界哲学史上讲实践论讲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讲战争辩证法讲得最好的也是毛泽东。这样一些学习的体验，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各种各

2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样的书都应当读，但最重要的首先应读的书是经典文本。

文本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 text，其含义是原文、正文、本文的意思。这个词本身具有中介的性质，它一头联结着著作家的原创性思维和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与物化了的艺术作品，它的另一头则联结着接受者的再创造性的思维，通过读者的接受，理论才能变为现实，并在现实的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艺术作品也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才能最终完成。我认为称得起经典文本的文本，应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独创性。康德在谈到“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时就说过，“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①（2）典范性。就作家创作的原作来讲，它不论在文体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有原创性、示范性的意义，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它自身不是由模仿产生，而它对于别人却须能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②鲁迅先生最反对青年人去看什么小说做法之类的书学习写作，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多看看中外大作家的成功之作。因为这些名作本身就回答了你应怎样去写的问题。（3）实证性。我们能阅读的文本，应是最能体现作者原意的最可靠的文本。对于外国的文本，最好的应是原文原版的文本，如果是译文，则应是依据原文原版翻译得最准确的文本。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本，则应是经过精校的最可靠的文本或版本，最好应是作者审定的手稿本。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指出：“一个可靠的版本，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定义，就是一个能够代表作家意志的版本。”^③他认为对于所有过了版权期限出版的和原文没有经过校正的版本，都要抱怀疑的态度。补救的方法就是应尽力接近或回到第一版本，出最可靠

①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第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陈铨译，第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的“精校本”，因为它最接近作者的原意。对于外国的和古代的理论性著作，更应重视其实证性和可靠性，只有在最可靠、最接近作者原创的文本中，才能更清楚地显示出其理论、学说的真理性。(4) 永久性。经典文本，自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本。就文学作品来讲，它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广大读者所喜爱。就理论著作来讲，这些经典文本，体现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典文本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它是人类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标志。在我看来，文艺学研究所依据的经典文本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文学经典文本，这是指中外文学史上那些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优秀作家所创作的具有独创性、典范性而又有永久性艺术魅力的原作；一是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那些具有一定真理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著作。而这两类经典文本，又是相互印证、相互联系的。文学经典文本，是在人类文学活动中开放出的美丽的花朵，它所提供的艺术实践经验，则是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主要依据；同时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科学性，又都应在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中，加以检验和应用。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无力对文学经典文本进行美学的阐释和解读，那么这种理论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与真理性就大可怀疑。任何经典文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所具有的真理性 and 局限性都是属于历史的。正是基于我对经典文本的这样一些认识，因此，我在新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就是从精读和重读经典文本开始的。

我国高校恢复高考制度以后，1977—1980年间，我给本科生主要讲文学概论、马列文论。在学生问及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怎样理解1885年11月26日恩格斯在致敏·考茨信中提到的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二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当时学界有一个口号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4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那么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来自何处？我查阅了许多国内外学者有关恩格斯这封信的阐释文章，对“这一个”的丰富内涵和真正出处都未讲清。我以这个问题为引线，认真地阅读了黑格尔的《美学》、《小逻辑》、《逻辑学》（上下）、《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结果在《精神现象学》中发现了黑格尔对“这一个”的全面阐释。1977年春，蒋孔阳先生同徐俊西、吴中杰、叶易诸位先生一起到山西师大访问，我曾当面向蒋先生请教，问他如何理解《精神现象学》中的“这一个”？蒋先生开始一愣，说他读过《精神现象学》，但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研究，回去要再查一查。此后我将学习的理解，写成《试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一文，正式发表在1978年创刊的《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上面。1978年10月在华东师大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上，蒋先生在大会发言中，特别向代表们推荐了此文，并说了一些赞誉的话。一个学界的无名小卒，写的一篇论文，得到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首肯和鼓励，当时，我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同时通过这个问题的研究，使我从理论上弄清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同德国古典美学的关系；另一个是对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的丰富内涵和方法论的意义及其在《美学》中的具体运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对进一步厘清我国学界对典型问题的种种看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人性、人情与人的本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是一个理论禁区。有多少学者就因为讲了人类的共同性、人性、人情问题，而被加上了“修正主义”的罪名。为了弄清文学与人的关系，我是从精读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经典文本入手的。这里的关键是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对此，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

林论》和有关书信中的论述，同时又将马恩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论述与费尔巴哈的论述加以比较，分析的结果，我没有完全接受列宁的观点。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①结合马恩的有关论述，我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关系：物质关系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如包括国家制度、法的关系，政党内部及政党之间的关系，军队监狱、统一战线等；思想关系或精神关系，如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潮、伦理关系、宗教关系、文艺风尚、民族习俗等；家庭关系，这是以生产人自身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集结点。所谓“一切”，从历时方面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共时方面讲，则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则是人的本质的具体的、感性的表现形态。由于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因此，人性的表现形态自然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在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这样理解的基础上，结合中外思想史、文论史上的有关论述，联系作品的实际，我又进一步探讨了文心、诗心与人心的关系，写成《文心、诗心与人心的沟通——论文学的人学的底蕴》。我的这些看法，在不少同行中得到了共识，认为这有助于对文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从事学术研究，选择什么作为切入点，以什么为主攻方向，也是我较长时间考虑的一个问题。早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对文学典型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研究生时，我有幸在蔡仪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典型问题》的毕业论文。以后结合中外文学史和美学史的学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系统地对典型问题进行了探讨。新时期开始不久，我重新将中断了十几年的研究拾了起来，于1984年完成《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的写作，1989年在《概述》基础上又补充修改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该书得到国内专家的肯定，并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它的出版，对我国文艺学范畴史的研究是有所推动的。蒋孔阳先生对此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他称我的研究，将典型问题纳入了“历史的科学范畴”，在学术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在对典型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使我认识到要系统掌握一门学科，就必须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从一个个范畴研究起。由于范畴是构成某一理论体系的细胞和“纽结”，体系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没有范畴就没有体系。因此，没有对范畴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准确地掌握某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建构起某种新的理论体系。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坚持以文艺学的范畴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对与典型有关的文学理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文学理想论》。书中从理论上对文学理想的内涵、特征以及中西的不同表现形态作了比较认真的探讨，提出“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艺术美”的观点，认为“理想是时代的旗帜，前进的动力，建设的指南。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理想的艺术家，是一个鼠目寸光只知爬行的艺术家，他永远不会攀登上艺术的峰巅”。此后，我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范畴体系，并同研究生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诸种文艺学范畴作了全面的梳理与概括，出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文艺学范畴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传播》。过去较长时间中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有没有体系争论不休，新时期初期我国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没有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构不成体系，并沿用韦勒

克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研究的多是涉及到文学的“外部规律”。但不论赞成有体系还是不赞成有体系的学者，对马恩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文艺学范畴，毛泽东提出了些什么文艺学范畴，都未作出全面系统的回答。我将马克思主义著名文论家的经典文本中所涉及到和提到的文艺学范畴，全面地加以整理，尽最大可能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原意进行阐释，从方法论范畴、本体论范畴、艺术生产系统范畴、艺术思维与艺术创造范畴、审美形态范畴、艺术理想范畴、文艺思潮与创作方法范畴、文艺发展论范畴、文艺批评与鉴赏范畴等9个方面，分13章，具体作了阐释。这些阐释是否科学，尚待进一步验证。但这项研究还是有学术价值的。胡经之先生在《文艺学范畴论》序中说，该书“具体展开了这些不同层次范畴的阐发、论证，使我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众多范畴有个全面的掌握，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宏大体系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这，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将是一种推进”。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中，我将“为人民”看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逻辑中心和最基本的出发点，由这一中心辐射、深化、衍生出十对范畴：源与流，普及与提高，继承、借鉴与革新、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美与艺术美，歌颂与暴露，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政治性与真实性，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对此，重庆炳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书评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十对范畴、概念的归纳整理及其精到深入的阐释，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系统性、完备性和体系性完全突现出来。……以人民为本位、为起点，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文艺思想的根本特点”。对于童先生的书评中的观点，杨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还专门向海内外读者作了介绍。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西方文论的范畴能否转换或溶入

8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之中，这也是十多年来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较广，需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回答。我采取了个案分析的办法，试图表达一点个人的看法。对于古代文论、诗论、艺术论的现代转换，我认为在中国 20 世纪的文艺学学术史中，宗白华先生解决得比较好。他从现代文学创作的 actual 体验出发，吸取了中外文论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范畴，初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生命美学新体系。（详见《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如何处理中外的关系，我重点个案分析了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实际关系，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论原则，较全面地分析了黑格尔《美学》在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负面效应。在多元共生的年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不少学者主张以多元化态势来概括世纪之交中国文艺学的走向。我主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从中国的国情和文艺学发展的实际出发，我认为用“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八个字来概括，可能更好一点。进入信息时代，是否是文学时代的终结、文学研究已成为过去？这点我也难以同德里达、米勒先生的观点相苟同，因此发出了一点自己的声音，写下了《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一文。在进入信息时代的新的世纪中，我坚信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和文艺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辉煌，“世界文学”的“黄金时代”，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

2001 年 8 月 24 日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上 篇

重读黑格尔

——谈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	(1)
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26)
中国文艺学的主要范式与走向	(50)
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	
——兼与 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	(59)
生命艺术化 艺术生命化	
——宗白华生命美学新体系的建构	(85)

下 篇

文艺学范畴论纲	(104)
圆道思维：东方智慧的花朵	
——论文艺学研究方法的中国特色	(131)
人的本质、人性与文学研究	(154)